

奔走号呼，求日军顾虑75万市民的生命财产，另划战线。结果移至哈尔滨南30里地带。幸到“八·一五”日军降服，才得安定。

回顾我任伪满官吏十四年间，为维护日伪的法西斯统治，推行奴化教育出了许多力，成为民族的叛逆，尽管有时不是从心所愿，但做起事来仍是不遗余力的，今天回想起来，真是愧悔难当。

“虎皮总监”齐知政^①

张楠麟

一、他递给野副昌德豹皮，又有张景惠的关照，才当上警察总监

1941年6月，齐知政由“间岛”省民生厅长出任伪首都警察总监的任命发布后，一时惹起纷纷议论。因为一般按惯例，首都警察总监都是先任哈尔滨警察厅长再转任奉天警察厅长后，才能调升为首都警察厅总监。齐知政却来个例外，由遥远的边境省份间岛，一步登天，一下子就被提升为首都警察厅总监，这种不寻常的调动升迁，自然要引起人们议论，议论的中心是说他和当时任首都防卫司令官的野副昌德有师生关系，即齐知政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野副是区队长，齐知政是走了野副的门路，送他两张虎皮才爬上总监宝座的，所以人们都在背

^① 标题由编者所加。

后称齐知政是“虎皮总监”。齐知政自己否认这一点，他说不是走的野副昌德的门路，所以当上总监，还是张景惠引荐的，当然，他也不否认与野副昌德有密切关系。

事实就是事实。齐知政与野副昌德关系确非一般。野副昌德这位剿杀杨靖宇将军的头号刽子手，与齐知政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有一段较为密切的师生之谊。“九·一八”事变时，野副在关东军兵事部任部员，齐知政追随熙洽在吉林省先投降了日寇。当了戒严司令，曾在顾问大迫通贞家里见过野副，彼此交谈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很是洽合，野副对齐知政的主动投降十分欣赏，特别鼓励了一番。当时齐知政也踌躇满志，自认投降有功，那时他身为吉林省军官教练处的少将总办，9月19日就代表熙洽陪同日本驻吉林的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来长春视察，是时长春已被日军包围，南岭驻有步兵团、炮兵团和辎重营，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武器一直锁在库内，在日军攻击下，爱国官兵激于抗日义愤，打开库房，拿出武器，进行了英勇的还击，见此情况，齐知政不但支持抗日义举，却暗下通知吉林镇守使李桂林、陆军第五十六团长马福麟和警察厅长修长余等人，赶快率军警部队撤出市外，静观事态发展，致使南岭驻军寡不敌众，孤立无援，牺牲很大，被迫撤出长春，日军得以从容占领。他和大迫如此“视察”过后返回吉林，作为见证人，谎报军情，硬说长春战事是当地驻军先开枪打起来的，并夸大日军实力，使熙洽更加坚定了不放一枪“礼迎”日军投降的决心。大迫通贞对齐知政的默契配合，十分满意，齐知政亦自我感觉良好，幻想着升官的锦绣前程……

按理关东军应该给这位首批投降的“功臣”以最好的安排，齐知政的幻想也并不算非份。那知齐知政找错了关系，他和复辟派熙洽勾连在一起，阴差阳错，几次机会都没赶上，始终没

有升上官。先是熙洽命令他将军官训练处解散改为戒严司令部，让齐知政做戒严司令，将军署卫队、宪兵营、警察厅、警察大队、省署卫队、水上警察局和稽查处等几个军、警、宪部门统归齐知政指挥，权力不小，却是个临时机构。日军多门师团进驻吉林后，取消了这一机构，熙洽又委派他当吉长警备司令，这一职务其实已有齐知政的老熟人李桂林担任，李因形势不明，率部队躲到磐石去了，齐知政当然不好就任。熙洽又派他去哈尔滨接任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之职，齐知政受命兴冲冲去哈赴任，岂料到那才知张景惠作为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已另派人，今见齐知政来，只好与特务机关长土匪原商量，让齐知政屈就副处长之位，齐因颜面难却，只好勉强就职，只呆了半个月，就不辞而别了。再次回到吉林找老熟人熙洽设法安排。齐知政回到吉林眼见戒严司令部被撤销归属吉林警备司令部，吉兴当了司令，在警备司令部下设有特务部，熙洽让他当了特务部长。不到两个月，特务部又取消，熙洽又让他当警备司令部附，齐知政感到这是个荣誉性的“闲职”，不想上任，只好在家闲居了一段，心里很是委曲。没办法最后还是去找熙洽，因军警界人员有“人满之患”，无法安排，熙洽动员他搞地方经济，虽名位不大，却能捞到实惠，齐知政想到有利可图，也就答应了，熙洽将他安排在自己所管的财政部下设单位，让齐知政当了辽源专卖署署长，接着又转任龙江、锦州、“新京”等几个大的专卖署署长，主要负责专卖大烟，还有食盐、石油、火柴、酒精、白面、木炭等紧俏用品。虽然官位不大（由荐任五等熬到一等），但确很实惠，捞了一些好处，积攒了一笔家财。对官瘾很大的齐知政来说，闹到这个局面，太不甘心，就凭“九·一九”降日的首批“功臣”，几年来东转西调，最后不但脱离了最熟悉的军警界，还降级使用，实在太委曲人了，特别是在提

升简任二等后竟被调到边远的间岛省任民生厅长，齐知政这种委曲情绪就更大了。间岛当地百分之六七十为朝鲜族，偏于一隅，语言不通，老婆不去，只身前往，生活不便，岂能久呆。正当齐知政想着“天无绝人之路”等待机会企求一逞时，机会来了，野副昌德作为关东军第六九九部队长出任东边道大讨伐司令官，主要在间岛、通化等地追剿抗联一路军，齐知政作为间岛地方的民生厅长动员商界捐款慰问野副的讨伐部队。他自然要借机对野副司令官有特殊的表示，本想送给野副两张珍贵的虎皮，老天爷不成全，那年长白山里没有捕获到虎，没有办法，齐知政只好在长春西伯利亚洋行化2000元买了两张豹皮送给野副，所以确据一点说，齐知政不该是“虎皮总监”，应是“豹皮总监”。齐知政送野副豹皮既祈求他引荐帮助离开间岛的意思，也有感念几年来野副一直设法关照他的恩情。“九·一八”之初，在吉林见面鼓励齐知政之后，野副又将伪军政部顾问中野英光介绍给齐，让中野对齐知政具体予以照顾。后来齐知政因眼患病，又和关东军方面人事不熟，仍走黑洽门路，在去龙江任专卖署长时，于路途中与中野不期而遇，中野对齐知政当专卖署长一事表示十分吃惊地说：“你是军人怎么干起这行来了？你还是回军界吧！”过了多久，黑龙江特务机关长广崎找齐知政，动员他回军界做龙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恢复少将级），并一再言说这是中野关照的。不过，当时齐知政因眼病很重不能坚持上班，仍推辞未就，广崎就介绍他去陆军医局请最好的眼科大夫为其诊治。这说明齐知政落魄到齐齐哈尔时，还能间接地得到野副关照，现在二人在延吉相见，又有豹皮在手，野副昌德不全力帮助才怪呢？

齐知政也知道，光是日本人引荐还不完全把握，要想万无一失，汉奸头头那里也要相机活动，老靠山熙洽已失了宠，不

能有什么指望，张景惠的门径不可放过，于是齐知政公开改换门庭，投向张景惠门下，频频拜访，直接要求调回吉林或长春。张景惠对他与野副的关系也早有耳闻，这位老奸巨滑的“总理大臣”很痛快地答应说：“调回吉林容易，马上就可以办，调回长春要等机会”。齐知政心想，这么多年我等过来了，还怕再等吗？总是回到首都体面，等下去，会有结果的。也真是活该齐知政时来运转，一是野副昌德讨伐杨靖宇有功，调升“新京”防卫司令官后，对首都军警界人事调升多有干预。二是当时伪首都警察总监姜全我与劣绅孙范五因聚赌争输赢起了纠纷，孙因输钱太多，咽不下这口气，告状到日本人那里，闹得满城风雨，日伪当局只好决定将姜全我调到通化省，首都警察总监出了空缺，这对齐知政是个绝好的机会。他系军警界出身，又有野副防卫司令官的有力关照和“总理大臣”张景惠的积极推荐，虽然齐知政官阶上差了一等，但也破例当了总监。他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卖身投靠到1941年历经十年沉浮，眼看五十岁了，才如愿以偿，算算也够可怜的。齐知政却不这么看，他还想大展其为官的宏图呢！

二、他一朝警权在手，便大行抓系之令

任职发表后，首都警察厅派特务科长安藤和警尉张福龄专程去延吉接新总监就任。这时，齐知政感到又风光又体面，美滋滋地来到了长春，下火车伊始，就先来了个不寻常的举动，直接去日本神社参拜，表示了对日寇的耿耿忠心。交办手续后，未等在“总监”位上坐稳，就急忙去关东军司令部，从司令官、参谋长、副参谋长直到主管对满事务的第四课，全都一一拜到，低声下气地请示关于如何加强首都警务统治的具体指示；又去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宪兵队和日本大使馆分别拜见了有关人士，

表示了愿与他们竭诚合作的愿望。还专门去伪治安部拜见日本顾问、次长、警务司长等这些顶头上司，当然，伪国务院的张景惠、武部六藏那里也是他必然拜会之地，其他像协和会等机关，齐知政也没漏下。刚一上任，齐知政就将各有关单位的头头都接洽上了，方方面面的关系也都照应好了，他开始在警察总监任上显露本色了。

首先，为加强经济统制，大抓经济犯。他同意了经济保安科长浦野的计划，组织首都经济委员会，由日本商人高堂出任会长。按伪政府7月25日颁布的“价格临时措置法”，要严格限制所有买卖物品，为此，齐知政命令8个警察署取缔积极配合经济委员会对所有商号进行物价检查，特在司法科内增设刑事警察队，借机四处滋事搜寻，轻者“说谕”、“换价”，重者送检察院起诉，或罚款或判刑，闹得商户惊恐不安。当时长春共有商户2000余家，每月平均受理10余件，一年总平均120余件，其中有40余件起诉。齐知政在任4年，共受理480余件，起诉160余件。其中作为大事件他们搞了两个，一件是1943年4月“英孚洋行”因违反“7·25”限价令，高价贩卖染料、机器针事件。经理刘松轩、李孝先等46人被捕，刘松轩被判了3年徒刑，李孝先被判2年半，“英孚洋行”财产被全部没收。与“英孚洋行”有关系的也受了牵连，如“英孚洋行”分行的李春林、李焕邦被罚款9000元，九台“东兴公”经理张少波罚去500元，榆树“泰和祥”副经理韩秉礼被罚300元。

第二次齐知政搞的事件亦在1943年6、7月间，“天德信”纸店经理曹主堂因违反限价被抓，一下子引起连锁反应，其它纸业、印刷业竟有12人被抓，曹亦被判刑3年。经齐知政为首的首都警察厅如此摧残，长春工商业迨至1945年上半年，95%以上的商号都有所谓经济违反行为，被抓、被罚事件屡屡发生，许

多商店、洋行闭门停业，市面一片萧条景象。而齐知政及其领导的伪首都警察厅犹不罢手，他们抓“经济犯”抓红了眼，越抓越凶，连市面上的小摊小贩都不放过，更常在城区路口设卡堵截郊区进城的粮车和菜车，凡遇上都被扣上“走私”的罪名，将东西全部没收，还要敲上一笔罚款作为外快。没收的菜蔬及粮谷等由警察厅和各警署私自分了，作为总监齐知政自然能分到一大份。对此，他后来还供认不讳。当时一般市民百姓吃橡子面代用品，连豆腐都买不到，而在齐知政家里却白面成袋、大米成包，清酒啤酒成箱，肉蛋成筐，生活十分富裕，两下对比，何等鲜明。他们哪里是打击“经济犯”，不过借此鱼肉百姓，达到中饱私囊的目的罢了。

其次，齐知政在伪都加强思想防范，大抓政治犯。专门在警察厅内成立司法委员会，由便衣刑警纠集地痞流氓，窜入工厂、机关、团体、学校、旅馆、医院、商店、各娱乐场所，暗中进行监视，窃听谈话，了解和掌握市民的思想动向，专门搜集所谓流言蜚语和传单、标语等，更要检查扣压信件和进口书籍，连民用的短波收音机也在查禁之列。按关东军的要求，连伪大臣的活动也在他的警网覆盖之下，表面上由警务厅负责向各伪大臣家中派出警察，说是保卫安全，实则暗中监视其行动及往来人员，每天均要向警署报告一次情况，综合起来再由警务厅向关东宪兵队反映。可见齐知政主持伪警务厅实行法西斯警务统治的严酷程度了。

齐知政领导伪警厅搞秘密侦察到一定时候，则大张警网，捕人抓人，逮捕政治犯事件迭起不止。大的检举事件有1941年的“一二·三〇”事件，以所谓违反“治安维持法”，将反满抗日作家李季风逮捕，继之，将“建国大学”参加“东北抗战机构”建大干事会、读书会的学生抓去21人，在伪首都警察厅加倍摧残，

为首的王宏文、张辅三等被判死刑，余者如柴纯然、杨增志等为无期徒刑，佟钧铠、慕长江等被判15年徒刑，最少的也判10年徒刑。还在工业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实行逮捕，抓去50余人。较大的还有1945年的“五·二三”事件，这次主要是抓捕国民党系统的抗日活动人员，有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罗大愚、肖辅仁、李京周、张兴波、石坚等300余人，波及面相当大，早在1944年就开始抓人，到1945年5月形成高潮，前后约牵连400余人。这两次事件，对知识界，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抗日力量打击很大。齐知政没有料到，“5·23”事件还涉及到一直给他治眼病的复明眼科医院王骏大夫，这真使他感到难心，不管吧，多年的交往，治眼病的恩人，管吧，又怕日本人不给面子，事情办不成，自己再受牵连，不就影响总监位置了吗？前思后想的结果，他自己没出面，让手下的特务设法说情，终于将王骏放了。王得知是齐赦了他，表示要来面谢，吓得齐知政一口回绝，怕找误会与麻烦，影响为官的前程。

1943年4月19日，齐总监又打响了抓“浮浪”的第一炮，白天晚间连续出动，据康德10年4月21日的《满洲新闻》报道说，“各热闹场所都成了地狱似的。”“共审讯了3860件，处理了1287件”。以后，每逢年节，齐知政动员8个警署人员全部出动，在车站、路口、公共场所，不管三七二十一，以“维持社会秩序”为名，大抓“浮浪”，将贫苦市民随便抓去，强迫服劳役。据伪首都警察厅司法科警尉补许栋梁供认，在东安屯东荣大桥的“更生训练所”中关押1200名“浮浪”，经他手先后押送做苦工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44年3月，押往密山滴道煤矿挖煤有80余人；第二次1944年3月，押往辽阳弓长岭铁矿采矿石约有80余人；第三次是1945年初，还是押往密山滴道煤矿仍是80多人。这些人多是有去无回，他们因冻饿加上过度劳累，常常

不治而死，死后填入万人坑。又据伪警长常俊义交代，他负责看守的伪首都警察厅司法科留置场内，从1943年7月到1944年11月，一年多的时间，被抓的“浮浪”有800多人，全被送往通化煤矿服苦役。

三、他贪污受贿，敲诈勒索， 集伪警察众恶于一身

齐知政除了上述的抓“经济犯”，抓“政治犯”，抓“浮浪”劳工，创造了“警政业迹”外，他个人还利用“总监”地位，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真是无恶不作。下面，我们将其劣迹揭示一二，其伪警察头子的丑恶嘴脸，也藉此曝曝光。

先看一个镜头：他伙同伪外交部调查司长李德天搞房地产交易，齐知政只担个人股的虚名，就凭“总监”权势贱价在公会堂旁边买到一座楼房，转手又倒卖出去，这一买一卖之间，齐知政他们就赚了几万元，他分文不交，就白白获取一半报酬。

当时建筑施工材料是经济统制的重点物资，严格予以控制。而齐知政个人却有个小建筑材料库，什么砖瓦、木料、水泥、玻璃、铁管、铁钉等紧俏物品，都应有尽有。他动用一部分大兴土木，在吉林南胡同盖一栋楼房。只因工程没按时完成，他就下令叫和顺警察署经济保安警察将保人樊发抓去，吓得包工头马文桢赶紧求“泰来顺”羊肉馆经理出面说情，同意齐知政提出的扣去一半施工费并保证抓紧盖完才算了事。其余的建筑材料有成堆的板材和成箱的玻璃砖，他曾寄存在“同华公司”陈锡山那里，想待机高价出售，结果到“八·一五”光复时，玻璃砖仍未脱手，陈锡山也没还，齐知政到了“战犯管理所”，仍念念不忘这笔帐。

齐知政自知这个“总监”位置来之不易，所以一朝权在手，

就到处摆威势唬人，连日本人小松开办的木材厂也不敢得罪他，常年免费供给他家烧用的碎木材。张景惠最得宠的六太太也都让他几分。一次，他遇见了与六太太合开茶庄的吕化民，齐知政问他：“茶庄有没有红茶？”吕化民马上心领神会连说：“有，有，过几天给总监送去点品尝”。果然，第二天就打发柜伙拿来十几盒好红茶。这还不算完，吕化民自觉送几盒茶是小意思，又是被动的，让人家问要的，于是他又筹划去了，过些日子，吕化民拿来一张水獭皮来拜访齐知政说：“这是一家买卖拍卖的，挺便宜，还真是块上好的皮子，我给你买来了！”齐知政拿在手中一看，果真油毛光亮，手感也好，暗想：“吕化民这小子，还肯花大价钱！真是块好皮子。”却表面不露声色地问道：“多少钱？”吕化民故作随便轻松地说：“不过几百块钱的事，你不用给了，小意思。”

齐知政不光自己到处做威做福，他还培养和纵容特务分子为他干坏事。比如他手下有个特务警尉栗宗元，跟齐知政的小老婆家过去是邻居，借这个关系也攀起近乎来。栗宗元甘当齐知政的走卒，借“总监”的名义，招摇撞骗。干尽了坏事。一次，齐知政去“金石斋”问鱼缸价钱，他说：“800元一个”，齐知政又问：“怎么涨价了！”伙计发牢骚说：“这还不如高粱米涨的多呢！”齐知政再没说什么，把这话记在心里，抽身走了。回去找栗宗元说了，栗宗元一拍手说：“哎呀，太好了，我正想调查调查他们厂的资金来源呢！怎么能说高粱米涨价快，这不是对现实不满么，查他个‘国事犯’！”“金石斋”经理闻说，赶紧拿老熟人吕荣寰的片子求见齐总监予以关照，齐知政眼见搬出了大臣吕荣寰，不好再刁难下去，才告诉栗宗元罢手。当然，这件事还不能算完，若不也太便宜“金石斋”了。过几天，齐知政又去“金石斋”声称要买拴小狗的铜链子，经理哪敢怠慢，陪

看笑脸上前招呼，结果300块钱的链子只要了150块钱，打折一半，齐知政到底还是拣个小便宜。有时小便宜他也拣不上，这位总监大人就要威风，在“东莱阁”齐知政就闹了一出甩手戏。那是他卖弄风雅叫“东莱阁”给他做线装书套，原说是用绸布做套面，不料去取时却是用更生布做的，齐知政马上就沉下脸来，责问伙计：“为什么改了？当初可不是这么讲的！”伙计也没好气地回嘴说：“现在店里就只有这玩艺儿，没别的！”气得齐知政拿起书套照直往伙计脸上摔，之后，拂袖而去。

据他自己交代，利用职权曾勒索过几笔钱。一是他的亲戚白国喜从德惠来长春要申请许可做鞭炮，找齐知政办许可。齐知政当即找了保安科的日本人技佐安池询问办证之事，安池说，现在正有人申请，让他们合作干吧！就把早先申请的人找来，该人满嘴胡吹说，这买卖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特别是正月一个月，少说也能赚个十倍八倍的利。齐知政见钱眼红，立即插嘴说：“我入5000元的股！”买卖人一听就明白齐知政的意思，转年出了正月，鞭炮收摊时，给齐总监送来红利1万元，彼此心里都清楚，所说5000元入股金，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但股息却含糊不得。

另有商人许治光因贩运粮食被警察厅查获事发，找齐知政说项，齐过问了一下，此经济案件就算作罢，许治光为表示谢意，送来1600元，连齐知政手下具体办事人也得了几百元的好处费。

此外，还有几件事，如有个李玉臣卖鞭炮和“同育堂”卖药，都被认为违反了“七·二五”限价令，人和东西全扣了，他们分别找齐总监，马上将人放了，为此，齐知政收了李玉臣送来的贿赂1万元，药店也拿来价值1000元的礼物。

上面这些小例子，只不过是个人交待或别人检举的，怕

是只能算他4年警察总监罪恶行径中的几段小插曲而已。东北老百姓凡上些年岁的，一提起伪满警察莫不恨得咬牙切齿，这些狗腿子助日为虐，帮助日本鬼子欺压人民，干尽了坏事，招得千人恨，万人骂。齐知政身为警察头子，更是集众恶于一身，其劣迹罪行，真是罄竹也难书了。

四、他拼命挤进日本军警宪 特圈里，寻找庇护伞

齐知政也深知自己做恶太多，没有靠山，没有后盾，难以在官场上维持下去，因此，他极力讨好张景惠，除感谢他的“荐举”之恩，更想以张景惠为靠山。因此，当粮食统制最紧张的时候，张景惠家的小老婆最得宠的徐芷卿来找齐知政，言说其母病故，要办丧事没有大米，请齐知政设法时，齐认为自己向张景惠讨好的机会来了，立即派秘书从警务科借车去长春郊区收大米，很快给徐宅送去两包大米，算是他齐知政的吊仪。若知道那时一般老百姓根本吃不上大米，谁家让警察查到大米粒就是“经济犯”，非押起来不可。而警察总监送吊仪可以成百斤一包的大米往外拿。真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平时，齐知政也是张景惠家的常客，特别是每年春节，他都要去张家聚赌抽头，给张家仆人凑份子钱，讨得张家上上下下都喜欢这位“总监”。庆贺张景惠七十大寿时，齐知政和于镜涛是主办人，办得热热闹闹，让老寿星很满意。

齐知政也知道，张景惠再大也只是个汉奸头儿，奴隶的总管而已，一切大权还都操在日本人手中。为保住自己“总监”的地位，他还要找日本人这个最大的靠山，光是一个野副昌德还不够，还要广泛结交各方面的日本人，特别是军警宪特圈子里的日本人。为此，他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达到了目的。和他关系

密切的有神岗宪兵中佐、儿玉宪兵大佐、内田宪兵队长、秋吉保安局长、市以弘报处长等警察特的头头。还有军政界的关键人物如总务厅次长神吉正一、大同学院部长三田正夫、关东军第四课长小尾、张景惠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等。齐知政更充分利用自己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的身份，打进日本军界人物活动的圈子里去，以示自己来头不小。1942年经野副昌德介绍，他参加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十一期同学会，入会者多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各方首首，如田村义富是关东军副参谋长，片仓衷乃防卫军司令部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活跃分子，长谷川系关东军报道部长，实为情报特务头子，山田俊介做为警务总局长是齐知政的顶头上司……齐知政以“陆士”同学的身份与他们在军人会馆聚餐，喝酒、玩乐，看炫耀皇军军威的电影，一起拍手叫好……齐知政简直忘了自己是哪国人了。

此后，宪兵司令官加藤少将还邀请齐知政骑马去南湖参加“远乘会”。参加者不多，只有十几人，全是日本宪兵校佐级以上军官。大家聚在南湖边上野餐、骑马、玩乐，只有齐知政一个中国人，他举目四望，十分自得，认为自己在日本军宪警界已经闯出了局面、站住了脚跟，有了很硬的后台，活动起来游刃有余，从此更加肆无忌惮。一次因为差遣向日本某会社借款出了问题，被手下经济保安科科长浦野所知，以借贷犯法的罪名，密告于检查厅官本次长，眼看齐知政将被传讯，多亏日本“陆士”三十一期同学会的关东军副参谋长田村帮忙，向官本打了招呼，让齐知政赶紧退款，此事才算平息。按说，齐知政应该从此收敛，夹起尾巴才是，岂料他自己仗恃根子硬，以“总监”之名继续干无法无天之事，闹得民怨沸腾，众目怒视，田村等日本关东军要人想庇护保驾也不行了。



五、自做孽不得活、“八·一五”前夕下了台，之后他还挣扎一阵子

所以在1945年8月上旬的一天，伪总务厅次长负责人事的古海忠之把齐知政找去说：“你当总监四年了，为你以后的前途考虑，你该动一动了。”齐知政知道自己的“总监”做到头了，到了该交任的时候了，挨到8月11日，张景惠告诉他：“把你安排到国务院当参事官，把警务厅的工作交了吧！”这时苏联已对日本宣战，形势十分紧张，“满洲国”岌岌可危，齐知政自付在长春的伪军警政人员中，自己是首当其冲，三十六计，走为上，参事官的任干脆不去赴，和张景惠谈完话当天，他就收拾细软，举家逃到双阳避风。

伪满垮台后，他不甘寂寞，想在乱世中东山再起。他虽没有参加维持会，却利用自己原来在旧东北军界的老熟人、老同学等关系积极进行活动，他与东北行辕外事处长李修业、东北长官部少将高参刘懋恩频频联系；他企图搞建军充当中将军长，只因派人去与杜聿明联系没有解决粮饷才作罢；他又帮助李修业网罗日本特务分子胜手俊太郎，让胜手在通化日本居留民中进行活动，阻挠与抵制向共产党、八路军投降，等待国民党接收；他还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过有关苏联红军的情报，等等，等等，很是活跃了一阵子，无非想投于蒋介石国民党门下，在东北政治舞台上继续活动起来。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击碎了他的妄想，只好灰溜溜地逃到了北平，又想改名换字欺瞒隐匿下去。那知隐瞒是不会持久的，这位诡计多端的伪警察总监，终于没有逃脱人民民主专政的法网。

（摘自《汉奸秘闻录》）